

文章编号: 1006- 4346(2002)01- 0018- 08

数量控制: 21 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

叶文振

(厦门大学 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在综述理论界讨论的基础上, 通过对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 说明调高总和生育率水平解决不了我国人口的结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不仅不能对过去的生育政策进行微调, 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率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 由此产生的人口自然结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优化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 数量控制; 生育政策; 人口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24. 21

文献标识码: A

Numerical Control The Guide to China's Population Fertility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YE Wen-zh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statistical dat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problems of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could not be solved by adopting a higher birth rat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one-child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and adjust population age and sex structure by optimiz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Key words numerical control; fertility policy; population structure

随着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人口转变”以及相伴而来的老龄化等人口新问题, 如何对待实行了 20 年之久的一胎生育政策也成为理论界日趋热烈的争论话题。最近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来自中国的报道 (Beech, 2001)^[1] 说, 一胎化政策可能将被修正, 其理由有三条: 一是迅速扩大的老年人口需要有人抚养; 二是性比例失调引起的男性人口结婚难会得到缓解; 三是不和各地具体情况相联系的统一的一胎政策是不合适的。本文将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

收稿日期: 2001- 10- 22

作者简介: 叶文振 (1955-), 男, 1991 年获得美国犹太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现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口研究所副所长。

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说明调高总和生育率水平解决不了我国人口的结构问题。相反,人口总量控制依然是我国 21 世纪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在这个导向下,一胎政策不仅要继续坚持,而且还要从城市推向农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

1 持续已久的政策争论

理论界有关一胎生育政策的争论其实在这一政策还没有实行之前就开始了,然后随着政策的启动和深入而不断激烈起来。早期争论的焦点是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程度,接着是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落实这一国策,再后来是对国策推行情况的评价及其正负面影响的估计,还有由此引发出来的关于国策是否要调整的讨论。

调整和完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最早是在上个世纪的 90 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曾毅, 1991;曾毅与金沃泊, 1991)^{[2][3]},此后,随着一胎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再生产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参与这一话题讨论的学者逐渐增加(李建新, 1996, 1997, 2000;梁中堂等, 1999;乔晓春, 1999;王国强, 1999;尹文耀, 2001;刘金塘和林富德, 2000, 2001;于学军, 2001)^{[4]- [13]},对我国生育政策未来走向的探讨也就成了我国人口研究领域的一个活跃地带。概括起来,有关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大约有以下几个观点(见表 1):

表 1 我国生育政策未来趋向的若干设想

序号	政策建议	主要理由	观点出处
1	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既能控制宏观人口迅速增长,又能减轻家庭的抚养负担	尹文耀, 2001
2	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1.8 左右或采取人口负增长战略	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就业压力,增强社会对人口老化的承受能力	刘金塘,林富德, 2000; 2001
3	实现人口的“零增长”	人口总数超过 16 亿,国家将不堪重负	李宏规, 2000 ^[14]
4	稳定低生育率,并关注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低水平生育率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潜伏着反弹的可能性;生育率急剧下降具有负作用	杨书章,汤梦君, 2000 ^[15]
5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即高的要降下来,适中的要巩固,而过低的要调整	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	于学军, 2001
6	退回上世纪 70 年代的人口政策,即“二胎加间隔”	更加科学和贴近实际,而一胎政策越过了一条合理的文化边界	穆光宗, 2000
7	向二孩政策过渡	回升城市人口生育率,避免“四二一”家庭结构的迅速出现	李建新, 2000

资料来源: 参见参考文献。

第一种意见是继续推行一胎生育政策。尹文耀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和系列负担系数比较评价后发现,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即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实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可以将按年龄计算的家庭负担降至与“二孩加间隔”的政策大致相当的程度,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却不能将宏观的人口压力减轻到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所能减轻的程度。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负担。但是,持一胎生育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多,政策声势相对比较弱小。

第二种观点是与“一胎”相对立的“二孩”政见。它包括李建新、穆光宗等学者的“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16]或“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17]等主张。李建新认为,过渡为二孩的生育政策是消除城乡二元人口控制政策,兼顾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双赢”的政策。他还提醒人们,生育水平的下降是不可逆的,就像日本政府一样,尽管通过鼓励生育,以期待生育率下降放慢,但却无法逆转这一趋势,因此,在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之前,适当地放松行政措施,使调节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有效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穆光宗则从我国生育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强调在21世纪放宽一胎政策的必要性,他断言,一个没有文化适应性的生育政策天然地缺乏可操作性,如果一定要推行,那么昂贵的代价,即快速的人口老化和持续偏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等,就是绝对难于避免的了。

最后一种建议是介于一胎与二胎生育政策之间,其主要代表是刘金塘与林富德(2001)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的人口负增长战略。二位学者对本世纪我国人口发展设计了三个方案,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8左右、到2010年下降到1.62后保持不变,或提升到2.1后保持不变,并分别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劳动就业的压力、对人口老化程度的承受压力和群众的生育意愿等方面比较评价这三个方案的动态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从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and 解决劳动就业的压力角度,本世纪中国妇女普遍生两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是不可取的,虽然它能使人口老化的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劳动就业的压力在本世纪将没有缓解的可能”;另一方面,为了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和防止人口的年龄结构不过度老化,长期保持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水平(即大约一孩半政策)也是不适宜的;综合来看,维持当前现实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即1.8才是一个较佳的生育政策选择^[18]。

从以上对争论的描述可以看出,刘、林的研究结果否定了李、穆的二孩政策主张,却和穆一样关注到我国的生育文化传统,对群众被政策压抑的生育意愿多了一份理解。而李却以发达国家生育率转变的事实,说明生育的文化边界不是不能突破的,少育甚至不育将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尹的一孩和二孩两种生育方案的模拟对比则打破了一孩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和家庭负担加大的必然联系,表明“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以上的描述还告诉我们,要深入这场争论必须澄清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新世纪我国人口问题的重点到底是数量控制还是结构调整;二是调整人口结构就一定要放宽生育政策要求吗?下面让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

2 数量控制是先于一切的大局

其实,不论从人口现状还是从本世纪的人口发展态势看,我国的人口形势都不容乐观,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背着一个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不断加大、加重的人口数量包袱,数量问题依然先于结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对于作长途旅行的我们来说,首先必须减负,或者缩小减轻背着包袱,尔后才顾得上如何摆放装在包袱里的东西。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局。

表2是我国与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几个与人口有关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对比资料。很明显,由于我国人口大包袱所散发出来的分母作用,许多重要的人均指标水平都被拉下来了。假如我国人口规模与美国相同,那么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会超过韩国达到14000美元,人均能源消耗就会高出英国、日本而上升到4139千克,人均中央政府在教育与卫生方面的支出也会分别提高到326和280美元。而且,在现有的人口规模制约下,一些人均指标是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的。即使人们大幅度地扩大我国教育和卫生的政府支出,分到每个人的手中又有多

少呢？而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均能源消耗，就会大规模地扩大我国对能源的总量需求，这样的话，我国有限的资源存量会不会加快枯竭？毫不夸张地说，不把我国的人口总量降下来，不少人均指标就无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表 2 我国与部分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入口、社会和经济指标对比

国家	2000年总人口 (百万)	2025年人口预 测数(百万)	平均人口增长 率(%) (1995- 2000年)	城市人口比重 (%) (1995年)	城市人口增长 率(%) (1995- 2000年)
发达国家					
美国	278.4	325.6	0.8	76	1.2
英国	58.8	60.0	0.2	89	0.4
法国	59.1	61.7	0.4	73	0.5
德国	82.2	80.2	0.1	87	0.3
澳大利亚	18.9	23.1	1.0	85	1.2
日本	126.7	121.2	0.2	78	0.4
发展中国家					
新加坡	3.6	4.2	1.4	100	0.8
韩国	46.8	52.5	0.8	81	2.1
中国	1277.6	1480.4	0.9	30	3.6

国家	每公顷可耕地农业人口(人)	总和生育率(1995- 2000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1998年)	人均中央政府支出*		人均能源消耗(千克)
				教育	卫生	
发达国家						
美国	0. 0	1. 99	29240	1567. 3	1913. 8	8051
英国	0. 2	1. 72	20314	1082. 7	1198. 6	3992
法国	0. 1	1. 71	21214	1281. 3	1511. 2	4355
德国	0. 2	1. 30	22026	1059. 4	1830. 0	4267
澳大利亚	0. 0	1. 79	21795	1187. 8	1240. 0	5494
日本	1. 4	1. 43	23592	849. 3	1362. 0	4058
发展中国家						
新加坡	7. 0	1. 68	25295	753. 8	274. 3	7835
韩国	2. 5	1. 65	13286	488. 9	341. 7	3576
中国	6. 3	1. 80	3051	71. 1	61. 2	902

* 来源资料未注明支出货币单位名称——编者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林晓红译).世界人口状况 2000: 2000年世界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Z].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1,(2).

庞大的人口存量还在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下持续带来规模不小的人口增量。出生人口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育龄妇女的数量和结构；二是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我国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在未来的十多年中还将继续增长。“十五”时期，全国育龄妇女人口数量将增加 1000 万以上，每年平均增加 200 多万。从结构上看，20- 29 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占全部育龄妇女中的同期比例将一直保持在 25% 以上，维持在 1 亿左右的水平(于学军，2001)^[19]。表 3 是根据育龄妇女不同的生育水平对我国人口在新世纪里的数量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如果实行“二孩加间隔”的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包袱将越背越大，其总量将一直维持

在 15 亿以上;即使按照总和生育率为 1.8 或降至 1.6 的政策设想,我们仍然要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背着总数为 10 亿左右的人口大包袱 规模庞大的育龄妇女的存在决定了我国不仅不能调高总和生育率,而且还要降低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快地从人口的重负中摆脱出来。

表 3 中国人口总数在未来百年的变动趋势 单位: 亿人

年份	刘金塘、林富德的预测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预测	联合国的估计	
	2010 年后 总和生育 率为 1.6	总和生育 率为 1.8	2010 年后 总和生育 率为 2.1	2005 年后独生 子女夫妇可生 二孩	1994 年的预 测结果	1998 年的预 测结果
1995	12.11	12.11	12.11	—	12.11	12.21
2000	12.70	12.70	12.70	12.69	12.85	12.76
2010	13.44	13.50	13.69	13.77	—	—
2020	13.93	14.20	14.66	14.72	14.88	14.54
2040	13.52	14.23	15.47	15.44	15.91	15.04
2050	12.72	13.69	15.44	15.22	16.06	14.78
2060	11.68	12.94	15.28	—	—	—
2080	9.67	11.54	15.22	—	—	—
2100	8.00	10.33	15.33	—	—	—
人口峰值	14.02	14.42	15.50	15.50	—	—
出现年份	2026	2030	2045	2040 前后	—	—

资料来源:① 刘金塘、林富德. 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J]. 人口学刊, 2001, (3);
② 国家计生委课题.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 [J]. 人口研究, 2000, (3);
③ 田雪原. 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1, (1).

3 多生解决不了结构问题

对一胎生育政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人均生育数量适当调高有利于缓和一孩政策所造成的我国人口在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上的失衡,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和“婚姻挤压”等社会问题,或者说明白一点,也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即数量控制带来的结构问题还必须通过数量调控才能得以解决。而我则认为,调高生育政策不仅解决不了我国人口的自然结构问题,而且还会加大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

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 15- 64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 1995 年为 8.07 亿人, 2000 年为 8.5 亿人,尔后将继续增加,并于 2020 年达到峰值,约为 9.97 亿人,比 1995 年增加近 2 亿人,约增长 23.5% (张妍, 2000) [20]。然而,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就逐年上升,到 1996 年达到 3%,失业人口约为 553 万人 (杨宜勇, 1997) [21]; 1998 年,登记失业人员继续攀升至 571 万人,涉及下岗人员 1200 万人左右 (蔡日方, 2000) [22]。在农村地区,失业现象或劳动力剩余更为严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有剩余劳动力总量达 2.14 亿,而这五年只能消化和转移 7700 万人,尚有 1.37 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安置。这样,城乡公开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劳动人口合计为 1.53 亿人,总失业率达到 21.4%,即平均每五个城乡适龄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 (冯兰瑞, 1996) [23]。另外,随着经济不断知识化和加入 WTO 后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信息自动化排斥劳动力的现象将会加剧,造成一定生产总量所需要的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例如,在美国,在今后若干年内,1.24 亿个工作岗位中的 9000 多万

个约 75% 的工作岗位将会逐步被取消,由自动化系统去负责执行有关的工作任务(朱国宏,刘子馨,1998)^[24];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也会使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偏低的我国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的相对数量的下降。在这样的就业态势下,多生人口是缩小了老年人口的比例,但并没有增强社会的养老能力,找不到工作的新生人口连自己都养不活,又怎么能担当得起养老的重任?相反,他们还要消费掉本来可以用来养老和自我养老的资源。要真正解决好我国的养老问题,关键是使闲置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并努力开发老年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加强现有人口和新生人口的养老的能力,特别是强化独生子女适应信息经济发展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经济收入水平。

其次,一胎政策下的生育性别偏好膨胀有多少转化为直接的生育性别选择以致造成多大的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还需要更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实际上,理论界并没有都把性别结构问题归因于政策的约束。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它还可能源于对出生女婴的不报或瞒报、较高的女婴死亡率以及直接或间接的人口统计差错(Peng and Guo, 2000)^[25]。因此,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真的偏高,还待进一步核查。假如我国出生性别比真的偏高,且主要归因于一胎生育政策与生育性别的男性偏好之间的不对衡,那么即使把总和生育率调到二孩,也不会有效地制止人们由于男孩偏好而人为地进行性别选择。不少城乡对比研究告诉我们,农村家庭比起城镇夫妇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男性生育偏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农村的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然而,在一胎政策推行的 20 年里,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是二孩生育的,据最近统计,农村独生子女比重仅为 10% 左右,城镇也才达到 63% (国家计生委课题组, 2000)^[26],可见调高生育水平并没有抑制农民对生男的生育追求,能真正起到平衡出生性别比的作用。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意识是否影响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从原来的生育政策制约转化为利益权衡和决策。日常生活中,长大成人的女儿对娘家的经济支持以及对父母的更多关照,未婚女性户外就业的机会增加,还有农村男性新生人口谋生难成婚难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母对子女效用的传统的性别判断,“生男生女都一样”甚至“生女更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也在现实生活的比较中慢慢形成。严梅福和石人炳(1996)在湖北调查中发现,招赘婚嫁模式有助于提高女孩的预期价值,进而淡化农民生男的意识^[27];厦门的孩子成本与效用抽查也表明,在被调查的夫妇中,认同男孩女孩都一样的比例已达到 70% 以上,其中在提供养老效用和精神享受效用方面,女孩的贡献已超过男孩(叶文振,1998)^[28]。这些研究结果都进一步证实,生男文化或“重男轻女”传统性别意识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或都市化加以变更的,这比起用调高生育率水平去迎合农民的生男需求,会更有利于保持正常的人口性别结构关系,而要加快城市化和促进制度创新,仍然离不开对我国过于庞大的人口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

最后,在过去 20 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我国生育率水平出现了“城低乡高”、“东低西高”的明显分化。例如,在不少落后的农村地区,生育率转变不充分、不彻底,或者具有较大的潜在的生育反弹,或者依然高于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在发达的城市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总和生育率则降到 1.0 以下,人口已转变为负增长类型。面对生育率的这种区域差别,有些学者提出,要打破城市紧(一孩)农村松(一孩半)的二元生育政策结构,在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城市地区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调控人口结构的目的(李建新,2000;于学军,2001)^{[29][30]}。目前,全国已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在计划生育条例中允许夫妇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国家计生委课题组,2000)^[31]。由于城镇独生子女的比重远高于农村,这种

政策性微调实际上是在刺激城市地区的生育率回升。本文作者认为,对城乡的生育率差别更应该是“削高保低”,也就是说农村的高生育率要降下来,城市的低生育率不要调整。理由有三:第一,对我国地区间的生育率差别,不能只从地区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认识,而应该从全国整体的人口形势发展需要来考查,并作出适宜的政策判断。在当前我国人口包袱还十分沉重的情况下,让城市在生育方面发挥“打折扣”作用,仍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城乡之间人为的社会隔离被疏通以后,农村或落后省份的多育所形成的就业等压力都会通过人口流动向其他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转嫁,变成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地区“削高”是不能放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在转嫁人口压力的同时,其实也起到对低生育率城市地区的劳动力补充作用,并通过参与流入地区的经济活动,间接地为当地积累社会养老资源,如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成为常住人口,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当地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运行中出现的结构问题是在城乡人口流动中得到化解的。第三,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和质量会影响和改变流入城市的乡村人口的生活观念和生育行为方式,并通过他们对更广大的农村进行示范和引导,使更多的乡村农民体会到孩子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不在于是男是女,而在于是否能成为适应现代竞争的有用有为之才,从而为在全国全面推行一孩生育政策创造有利的文化环境。

4 结论

21世纪是我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生育政策把握如何,直接关系到百年过后,我们是彻底甩掉人口包袱,还是越背越重,以致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本文作者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不仅不能对过去的生育政策进行微调,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率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由此产生的人口自然结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优化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加以解决。

从理论上讲,我国人口目标及与之相对应的生育政策的确定取决于我国最大的和最佳或适度的人口容量。我国最大和适度人口容量的研究分析结果差别较大。如宋健等人从淡水资源的角度估算,我国适度人口规模在 6.3~ 6.5 亿之间;王浣尘、胡保升利用可能度和满意度等多元综合决策法,得出百年后我国适度人口总量居于 7~ 10 亿之中(刘金塘、林富德, 2001)^[32];袁建华等人以人均年用淡水量 532 吨和人均粮食需要量 500 公斤计算,发现我国的适度人口分别是 11.45 亿和 16 亿(袁建华等, 2000)^[33];还有蒋正华等估计,我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 15~ 16 亿左右(1997)^[34]。显然,未来稳定人口数越小于我国最大或适度人口数量,人口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压力就会越小,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也越足(袁建华等, 2000)^[35]。从实际来看,我国和美国的人口、社会经济指标对比又明确告诉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我国适度人口规模是以较低的人均水平和消费发展结构来确定的,要想尽快达到美国目前的生活质量水平,以至今后持平发展,我国人口总量绝对不能过度地超出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人口数量的控制还任重而道远,真的乐观不起来。这就是本文倡导继续全面贯彻一孩生育政策的根本原因。

鉴于我国人口数量控制的长期性,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逐步凸现的人口年龄老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等自然结构失衡问题自然不应该再用多生的办法来解决。在这方面,又要从人口数量的情绪中走出来,拓宽解决结构问题的思路。本文作者认为,我国人口自然结构失衡及其带来的后果可以在人口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中逐步得到恢复和化解。在近期,农村人口城镇化,不仅会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而且还会减缓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的增长速度。从长远看,通过教

育制度改革,提高独生子女单位孩子的家庭效用;通过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扩大女孩子的家庭效用;在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推迟法定退休年龄,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淡化性别意识的婚嫁模式,都十分有助于减轻和消解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 Beech, Hannah. China's lifestyle Choice[J]. *Times*, August 6, 2001, P. 32.
- [2] 曾毅.逐步提高平均生育年龄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影响 [J].人口与经济, 1991, (2).
- [3] 曾毅,金沃泊.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J].中国社会科学, 1991, (3).
- [4] 李建新.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农村生育政策 [J].人口与经济, 1996, (4).
- [5] 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 [J].人口研究, 1997, (1).
- [6] 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J].人口研究, 2000, (2).
- [7] 梁中堂等.中国人口控制状况与生育政策趋向研究 [J].人口研究增刊, 1999.
- [8] 乔晓春.关于 21 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思考 [J].人口研究, 1999, (2).
- [9] 王国强.对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J].人口研究, 1999, (3).
- [10] 伊文耀.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J].人口学刊, 2001, (3).
- [11] 刘金塘,林富德.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新世纪人口态势模拟 [J].人口研究, 2000, (4).
- [12] 刘金塘,林富德.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J].人口学刊, 2001, (3).
- [13] 于学军.“十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前瞻性研究 [J].中国人口科学, 2001, (1).
- [14] 李宏规.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 [J].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0, (3).
- [15] 杨书章,汤梦君.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J].人口研究, 2000, (4).
- [16] 同 [6].
- [17] 穆光宗.“一胎化政策”的反思 [J].人口研究, 2000, (4).
- [18] 同 [11][12].
- [19] 同 [13].
- [20] 张妍.中国失业问题综述: 1996- 1999[J].人口学刊, 2000, (1).
- [21] 杨宜勇.失业冲击波 [M].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 73.
- [22] 蔡昉. 2000 年: 中国人口问题报告 [R].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0.
- [23] 冯兰瑞.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与对策 [J].社会学研究, 1996, (5).
- [24] 朱国宏,刘子馨.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211.
- [25] Peng, Xizhe and Guo Zhigang.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Blackwell. P. 72- 73.
- [26] 国家计生委课题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 [J].人口研究, 2000(3).
- [27] 严梅福,石人炳.中国农村婚嫁模式在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 [J].中国人口科学, 1996, (6).
- [28] 叶文振.孩子需求论: 中国孩子的成本与效用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253.
- [29] 同 [6].
- [30] 同 [13].
- [31] 同 [26].
- [32] 同 [12].
- [33] 袁建华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谈 21 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前景 [J].人口研究, 2000, (4).
- [34] 蒋正华,张羚广.中国人口报告 [R].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 [35] 同 [33].

[责任编辑: 蒋来文]